

## 目錄

弁言 / i

### 楔子 歷史遺留的困惑 /001

尼克松與「十字軍般的熱忱」 /002

1950年10月的危機時刻 /005

從教宗子午線到西太平洋防禦線 /015

作為世界史悖論的大西洋革命原則 /029

### 一 基辛格與馬基雅維利之道 /043

新中國對美國文明的挑戰 /045

基辛格如何理解新中國 /051

基辛格如何解釋「世界新秩序」 /056

### 二 太平洋東岸的行為特徵 /062

西奧多·羅斯福的言與行 /064

美西戰爭的東南亞戰場 /075

何謂世界歷史的威爾遜時刻 /084

美國行為的「矛盾」特徵 /094

### 三 盎格魯—美利堅行為的根源 /103

狄森特精神與美國意識 /106

最低人性的道德法則 /118

寬容與不寬容 /129

孟德斯鳩與政治自由 /142

康德與激進自由主義 /151

### 四 共和愛國主義的悖論 /163

古典學問在美國的困境 /164

何謂「共和愛國主義」 /174

美國的君主與人民 /185

什麼是我們的內憂外患 /194

### 五 清教文明的戰爭威脅 /212

美國理念與有限核戰爭 /214

《註定一戰》如何援引史例 /227

清教式歷史意識為何偏執 /244

重啟五百年文明史舊案 /255



## 弁言

2017 年底，拙著《以美為鑒：注意美國立國原則的是非未定之爭》面世，隨即引來坊間訾議甚至痛斥——據說，「豆瓣」書訊上給 1 分的讀者近四成。這倒在我意料之中，畢竟，自改革開放以來，對美國文明的由衷傾慕已扎根在我們絕大多數學人心中。

我沒有料到的是，僅僅三個月後（2018 年 3 月），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就打響了，且不斷升級。短短三年間，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迅速擴大到諸多領域，阻擊高科技產業和軍事施壓尤為顯著。我國學人對美國的深厚情感因此而一再遭受重創，儘管這絲毫不意味著我們對美國文明品質的認識會有所長進。我國知識人致力於認識西方文明已有一個半世紀，但對於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美國文明的德性品質這樣的重大問題，迄今懸而未決。

劍橋學派的政治史學把十八世紀的費城時刻與十五世紀末的馬基雅維利時刻連成一線，以此推進激進的普世民主運動，這促使我在《以美為鑒》中從五百年來的世界大歷史視角思考中國文明與美國文明的相遇。現在看來，進一步展開《以美為鑒》的思考實有必要。畢竟，要透徹理解美國今天的行為，還得從政治史學角度探根究源。雖然這極為困難，

卻有必要一試，哪怕做不到周全。

本稿付梓之際，時逢老友甘陽榮開七秩，正好用作壽禮，以誌我們在北大 25 樓同樓不同窗以來的四十年友誼。

本稿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中國人民大學「雙一流」建設資金資助）項目（批准號：22XNLG10）成果之一，特此註明。

2021 年 9 月初稿，12 月改定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 楔子 歷史遺留的困惑

我 15 歲那年上高中（1971 年秋），僅僅一個月後就作為市立中學建設戰備高中先遣班的一員，進入長壽湖山區收拾已經初步建成的有如戰鬥工事般的校舍，為全校遷移做準備。整整一個學期，我們先遣班同學的課程全是土工作業，誰也沒想到，學期結束後，我們遇到了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極為震撼的歷史事件：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訪問中國（1972 年 2 月）。

從小看電影《英雄兒女》長大，我的腦子轉不過彎：「美帝頭子」怎麼可能訪問中國，還笑咪咪地與毛主席握手，毛主席也笑咪咪地看著他？

我從《人民畫報》上取下這張劃時代的照片放進書桌，每天都禁不住拿出來凝視片刻。緊接著，深山中的戰備校舍被廢棄，我們全校師生遷回城裏——但這不是尼克松訪華的結果，而是另有原因。高中畢業後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1974 年春），我沒有忘記帶上劃時代的照片。我把它貼在破舊的木板農舍正中，當繁重的農活讓我疲憊不堪甚至心灰意冷時，看一眼這張照片就會重新煥發莫名的振奮，湊在煤油燈下讀書。

1957 年冬天，毛主席赴莫斯科參加國際會議，其間對我國留蘇學生講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從上小學起，它就激勵著我努力學習。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sup>①</sup>

從初中到高中我都在想：「世界是你們的……」——但「世界」是什麼呢？很久以後我才明白，要知道什麼是「世界」，還得從世界歷史入手。問題隨之而來：什麼是世界歷史？那個時候，無論古代中國的歷史還是美國的歷史，我都所知甚少，遑論世界歷史。

無論「世界」是什麼，總之與新中國的命運相關，這在一開始就很清楚。問題在於，新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關係是什麼呢？

### 尼克松與「十字軍般的熱忱」

有位年長得多的老知青告訴我，沒有抗美援朝戰爭，兩位國家領導人不可能這樣相互微笑——尤其是毛主席的微笑，其世界歷史含義尤為深遠。他還借給我一本「內部發行」的《六次危機》，這是我讀到的第一本美國人寫的關於美國政治和世界政治的書。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其中一段話給我留下的印象迄今難忘：

我們的目標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是將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別人。但是我們的基本信仰，也就是每個民族具有獨立的權利、個人自由和人權乃基於宗教信仰，而且由於它們為上帝所賦予，就不能被人們所剝奪，這種基本信仰一定要灌輸給新的一代。我們的信仰一定要同一種發動十字軍的熱忱結合起來，不僅保住我們自己，而且要改造世界——包括共產黨世界在內——並且要不經過一場熱戰就贏得為爭取自由、個人尊嚴和真正經濟進步而進行的戰鬥。<sup>①</sup>

即便在今天看來，這段話仍然是美利堅精神的標準表述。當時我還年輕，看不出這段話明顯的自相抵牾：既然宣稱不會將美國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別人」，何以又如此堅定地宣稱要將美國的「基本信仰」「同一種發動十字軍的熱忱結合起來……而且要改造世界」？這豈不是與宣稱「每個國家（every nation）具有獨立的權利」相抵牾？

20多年後（1999），我讀到這本書經過校訂的新中譯本，「發動十字軍的熱忱」變成了「改革的熱忱」——我大吃一驚，很長時間百思不得其解。<sup>②</sup>

「a crusading zeal」譯作「發動十字軍的熱忱」似乎有些過頭，尼克松很可能用的是 crusading 的喻義，亦即「堅

<sup>①</sup> 引自〈毛主席會見留蘇學生〉，載於《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0日第1版；亦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248。

<sup>①</sup> 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機》，北京大學法律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六次危機》翻譯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頁110。

<sup>②</sup> 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機》，黃興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頁96。

忍不拔的熱忱」。儘管如此，這個語詞畢竟源於西方基督教十字軍東征的歷史，若譯作「十字軍般的熱忱」，並非不符合尼克松在這裏所說的「不僅保住我們自己，而且要 to change the world（改造世界）」的含義。半個多世紀之前，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lson, 1856–1924）總統就為剛剛崛起的美國立下過這樣的偉大宏願：進行 Great Crusade（偉大的十字軍東征）。<sup>①</sup>

十九世紀後半期，「西方人再次轉向了東方地區」——尤其是文明古國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於是有史學家撰寫了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史，以便「向大眾普及聖戰」，因為，此時的歐洲「比以往更加需要理解十字軍東征中所有美好的、社會性的精神」：

十字軍東征卓越的希冀是為基督教的利益征服東方，為了帶領整個人類大家族走向慈善、和平和光明，基督教的統一戰線在整個大地上建立起來。在羅馬世界，宗教統一的實現將呈現出比政治統一更加壯美的景象。<sup>②</sup>

在威爾遜那裏，中世紀西方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變成了現代清教徒式的自由民主東征，尼克松所說的「a crusading

zeal」無論如何不會是「改革的熱忱」，只會是十字軍鬥士般的熱忱。<sup>①</sup>《六次危機》的兩個中譯本相隔不到三十年，同一個語詞的譯法差異如此之大，這意味著什麼？難道我們知識人心中的改革熱忱出於尼克松所說的「基本信仰」？

## 1950年10月的危機時刻

《六次危機》新版中譯本的介紹文字還說，尼克松所經歷的六次危機「令人激動而又扣人心弦」，「展示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看來，1990年代的我國知識人已經忘記，毛澤東經歷過的危機難以計數，也較之嚴峻得多，隨便挑選六次出來，都會讓尼克松的經歷黯然失色。只不過，即便是誰有修昔底德式的筆力，也很難把毛澤東經歷過的危機記敘得既激動人心而又扣人心弦。

抒寫詩詞伴隨著毛澤東所經歷的危機重重的政治生涯，他在危機時刻寫下的詩句，有時甚至連自己都忘了。毛澤東面對的危機無論多麼險惡，最終都化作了辛棄疾風格的壯美詞句：「蒼山如海，殘陽如血。」誰若多少有點兒中國教養，他都能夠從中感領到一種厚重的古典情懷，或者說非常傳統的中國政治品格。<sup>②</sup>

① 參見 Ralph H. Gabriel,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New York, 1962, pp.387–404。

② 米肖、普茹拉，《十字軍東征簡史》，楊小雪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頁4；比較拉爾斯·布朗沃思，《燃燒的遠征：十字軍東征簡史》，嚴匡正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G. Tate，《十字軍東征：以耶路撒冷之名》，吳嶽添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① 參見佩里·安德森，《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頁136–145。

② 比較丁力，《地緣大戰略：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及其戰略選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引言」，頁10–11。

相比之下，尼克松的危機經歷所展示的政治品格低劣得不可比擬：對尼克松來說，危機「純屬於個人的東西」；在毛澤東那裏，任何危機都與中華民族爭取「獨立權利」的歷史使命維繫在一起。無論遇到什麼危機，他都會「亂雲飛渡仍從容」——僅有極少數例外，比如1950年的朝鮮半島危機。

美國干預朝鮮半島內戰並介入中國內戰之後，毛澤東毫不遲疑地做出反應（7月3日），迅速部署一個集團軍進入遼東半島北部，在鴨綠江右岸一線戒備。僅僅兩個多月後，朝鮮半島戰局急轉直下。10月3日這天，金日成將軍的特使攜將軍親筆信抵達北京請求援助，因為兩天前，南朝鮮軍已經在襄陽一帶越過「三八線」。從這一天起到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10月19日），是驚心動魄的16天——尤其最後10天，毛澤東經歷了一生中最为艱難的抉擇之一。因為，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元帥突然收回兩個多月前（7月5日）的承諾：若美軍越過「三八線」，中方出動地面部隊，蘇方出動空軍掩護，共同打擊美軍的進犯。<sup>①</sup>

10月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商討是否出兵，歷時數日，多數意見認為出兵不利。10月7

日，美軍也開始越過「三八線」。10月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尚未結束，周恩來總理「帶著不出兵的意見」飛往莫斯科與蘇方磋商。斯大林仍然鼓勵中方出動志願軍，認為這樣有助於新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因為「在戰時完成這樣的計劃，要比平時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sup>①</sup>

其實，周恩來離京的當天，毛澤東已經最終做出出兵決定，並正式發佈軍委主席令，「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年譜》卷一，頁206–207）。從這時起，毛澤東就像在解放戰爭時期那樣，親自指揮前方的作戰行動。10月10日，毛澤東分別致電金日成和彭德懷，特別提醒他們要警惕美軍在「鎮南浦至新義州一線可登陸之海岸」開闢新登陸場，必須注意保護從平壤至新義州的交通線不被敵切斷（《年譜》卷一，頁208）。

周恩來在黑海之濱與斯大林磋商後返回莫斯科時（11日），才得知毛澤東力排眾議有了新的決定。他閱過電文後「雙手抱著頭，陷入深深的沉思」，因為僅僅幾個小時前，他與斯大林磋商時表達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師哲，頁359）。周恩來隨即與蘇方重新磋商，然後給毛澤東發電，告知蘇方的承諾沒有變。可是，次日中午時分，周恩來又發電說，斯大林稱蘇聯空軍「至少兩個月後才能到位」，而朝鮮人民軍最多只能支撐一個月——電報最後一句是：「等待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65–166（以下簡稱「《年譜》卷一」，隨文註頁碼）；比較逢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25–31。

<sup>①</sup> 師哲口述，《在歷史巨人身邊》（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頁355–358。

您的決定。」

接到周恩來的電報之前（12日上午），毛澤東已電令志願軍第二梯隊宋時輪兵團的12個師「提前北上，直開東北」（《年譜》卷一，頁210）。下午3點30分，毛澤東看到來電非常吃驚。4個半小時後（晚8點），他給一線發出急電，「10月9日命令暫不實行」（《年譜》卷一，頁211），但晚10點12分給周恩來的電報則說，請轉告斯大林，我方「已命令中國軍隊停止執行進入朝鮮的計劃」。兩封電文相隔僅兩小時，內容卻有重大差異：通報蘇方的電文是「停止執行」計劃，而給遼東前方的電令則是「暫不實行」計劃。

對蘇方的說辭很可能是激將法，以促使其回到先前的約定。斯大林稱蘇聯空軍「至少兩個月後才能到位」明顯是託辭，因為瀋陽已駐紮有一個蘇軍的殲擊機師，而蘇軍在遠東地區至少還有4個殲擊機師。三天前（10月8日），美軍兩架戰機曾襲擊蘇聯濱海地區蘇哈亞市附近機場，蘇聯的反應明顯溫和。而這時，平壤方面的情勢進一步告急：10月12日，金日成「通過彭德懷請求毛澤東盡快出兵援朝」，因為「美軍三個師、英國一個旅和南朝鮮一個師準備進攻平壤」。<sup>①</sup>毛澤東已經感覺到，要麼放棄扭轉半島戰局，要麼新中國得單獨承擔救援行動。他當即電召彭德懷和高崗返京磋商，畢竟，他們的作戰部署仍以蘇聯出動空軍為前提。

10月13日中午，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由於毛澤東並沒有改變出兵決斷，這次會議與其說是要與政治局成員和兩位前線指揮重新商量是否撤回出兵決定，不如說是要告訴他們，我方不得不在暫時沒有蘇聯空軍支援的條件下作戰，因為斯大林並沒有收回出動蘇聯空軍的承諾，僅僅說「至少兩個月後才能到位」。

當晚10點，毛澤東給周恩來發電，告訴他政治局仍然決定志願軍即刻出動：

在第一時期可以專打偽軍，我軍對付偽軍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線以北大塊山區打開朝鮮的根據地，可以振奮朝鮮人民重組人民軍。兩個月後，蘇聯志願空軍就可以到達。6個月後可以收到蘇聯給我們的炮火及坦克裝備，訓練完畢即可攻擊美軍。（《年譜》卷一，頁211-212）

從措辭上看，整個電文雖然主要談軍事行動，但政治決斷更重要。毛澤東強調，志願軍即刻入朝首先「殲滅幾個偽軍的師團」，其政治影響「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否則，我方在軍事上會陷入被動，「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年譜》卷一，頁211）。

毛澤東在電報中讓周恩來把決定轉告斯大林時特別強調，「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並能派空軍拱衛京、津、瀋、滬、寧等

<sup>①</sup> 尤·米·加列諾維奇，《兩大領袖：斯大林與毛澤東》，部彥秀、張瑞旋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頁457。

大城市的空防，新中國軍隊在朝鮮作戰就有希望。毛澤東心裏十分清楚，在蘇聯空軍沒有到位的「兩個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受一些損失」（《年譜》卷一，頁212）。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提到，眼下新中國政府無法為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支付現款，只能「用租借辦法」，這讓今天的我們讀來不免心酸。如今我國有了大量外匯儲備，但我們不應該忘記，在那個時候，新中國不得不靠「借錢」維護自己的國家尊嚴和安全。

14日凌晨3時和晚9點半，毛澤東兩次致電周恩來，詳細告之志願軍入朝後的作戰方案，並讓他向斯大林通報：志願軍將於五天後（10月19日）過江，十天之內（28日）南進至「德川—寧遠線以南地區」，「構築兩道至三道防線」（《年譜》卷一，頁213—214）。根據當時的敵情擬定的這一作戰方案相當保守，僅僅是將國防線推進至鴨綠江左岸德川、寧遠及其以南一線，等蘇聯提供的軍事裝備到來，半年後再發動攻擊。

幾個小時後（15日凌晨），毛澤東得到朝鮮方面情報，美韓聯軍加速北進，已對平壤形成三面包圍。毛澤東當即（凌晨5點）電令高崗和彭德懷提前行動，兩個軍於17日和18日接續過江，前鋒當於23日進至德川一線「制敵先機」。當晚，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速與蘇方商量，「可否從商訂掩護城市的噴氣式空軍中先抽調一個師來北京」擔負空防（《年譜》卷一，頁215）。毛澤東已經考慮到最壞的可能性：一旦開打，美軍有可能對新中國首都實施戰略轟炸。

斯大林也收到平壤告急的情報，他的反應是，隨即指示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1890—1986）轉告尚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蘇聯空軍僅能負擔鴨綠江左岸的中國境內空防。顯然，斯大林明確收回了先前的承諾：即便兩個半月後，蘇聯空軍也不能入朝掩護中國志願軍的地面作戰。此前斯大林剛剛得到情報：13日清晨，與平壤—元山一線平行的半島東岸海面，出現了美第七艦隊由三艘重型航空母艦組成的戰鬥群（含各類戰艦21艘及兩棲部隊），對咸興地區實施猛烈的海上和空中打擊。斯大林憑自己的豐富戰爭經驗自覺地意識到，新中國軍隊僅有步兵，且裝備太過低劣，投入半島作戰無異於飛蛾撲火。

周恩來總理在外交場合一向溫文爾雅，這時也忍不住對莫洛托夫「當場發火」。<sup>①</sup>毛澤東在16日接到電報後，心頭極為沉重。軍情峻急，容不得半晌耽誤，正是在這一時刻，毛澤東感到決斷的艱難——《毛澤東年譜》中的這一天是空白！

第二天（17日）下午5時，毛澤東終於致電彭德懷、高崗，收回15日電令兩個軍在17和18日先行的成命，讓兩位立即返京議事。不難設想，電令若再晚兩小時，志願軍前鋒部隊已經過江。

18日，周恩來回到北京，毛澤東立即召開會議，並下

<sup>①</sup> 張民、張秀娟，《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40。